



俄国共济会与 俄国近代政治变迁

(18-20世纪初)

赵世峰 著

本书由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 资助出版
复旦大学出版基金

俄国共济会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 (18—20世纪初)

赵世锋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共济会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18—20世纪初)/赵世峰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309-08350-7

I. 俄… II. 赵… III. ①社会团体-研究-俄罗斯-近代
②政治-研究-俄罗斯-近代 IV. ①C235. 12②D751.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0807 号

俄国共济会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18—20世纪初)

赵世峰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218 千

201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350-7/D · 516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学界有关研究综述	3
第三节 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和史料	19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主题思想	26
第一章 俄国近代新政治因素的导入：共济会	29
第一节 俄国共济会的起源	29
第二节 俄国共济会的组织宣传形式	37
第三节 俄国共济会的政治哲学观念	44
第二章 启蒙运动下的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	55
第一节 18世纪俄国共济会的发展及其与俄国政治的关系概述	56
第二节 俄国共济会与18世纪俄国启蒙运动	66
第三节 “共济会式的启蒙”对俄国政治的影响	91
第四节 俄国共济会与18世纪下半期的沙皇政府	102
第三章 19世纪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变迁	123
第一节 19世纪俄国共济会发展及其与俄国政治关系概述	123
第二节 俄国共济会与19世纪初的沙皇政府	130
第三节 俄国共济会与十二月党人早期组织	138
第四节 俄国共济会对普希金政治观的影响	154

第四章 20世纪初俄国政治巨变中的俄国共济会	165
第一节 20世纪初俄国共济会的发展及其与俄国政治关系概述	165
第二节 “俄国人民大东方”共济会组织	180
第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	186
第四节 俄国共济会与1917年俄国政治巨变	194
结语 俄国共济会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	219
附录一 俄文人名译名对照表	227
附录二 俄文专有名词译名对照表	234
附录三 英、法文人名、专有名词译名对照表	242
参考书目	246

导 论

俄国共济会(Рус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对近代俄国政治进程造成过深刻的影响。著名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Н. Бердяев)在《俄罗斯理念》(Русская идея)中写道：“共济会是我们18世纪仅有的精神—社会运动，它的意义是巨大的。”^①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共济会于18世纪初传入俄国。之后，便如同自由主义(Liberalism, Либерализм)、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西方派(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等有着复杂内涵的历史名词一样，成为俄国历史上一种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现象。具体来说，它因为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成为俄国近代史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并且成为界跨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独立研究课题。

第一节 选题意义

共济会自传入俄国后，就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为数众多的贵族^②、政治家和文学家等的相继加入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这些加

①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 2000, С. 21.

② 在俄国近代史上，俄国贵族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18世纪上半叶，协助皇权的贵族形成了一个等级。1775—1785年间，贵族获得了在各省建立等级组织及参与国家政治的合法权利。直到农奴制被废除为止，贵族不但垄断了文武高官的职位，而且还把持着中央政府的各个要害部门，对势力最大的几个贵族团体，就连沙皇也要另眼看待。在形成具有高度自主意识的特权等级后，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贵族始终是足以决定其导向的社会舆论主体，因为他们享有发表言论的权利和可能。参见〔俄〕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下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1—132页。

入了俄国共济会的人来讲,很难说共济会没有对他们的世界观产生影响,也不能说共济会的意识形态没有对他们的创作有所推动^①。遗憾的是,像俄国共济会这样一个纵贯了整个俄国近代史,甚至活跃在当代俄罗斯社会中,影响广达方方面面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在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俄国共济会与俄罗斯理念、俄罗斯知识分子一起,构成了俄罗斯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俄国共济会与18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政治关系的研究,进而对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互动研究,也即俄国共济会与18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政治变迁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俄国共济会研究有助于从微观上弄清楚许多俄国历史事件,有助于了解俄国历史事件的内幕和真相。俄国共济会成员基本上来自社会上层,是个精英型组织,他们之间的团结互助、兄弟般相处、遵从师傅吩咐等原则使其很容易就某个问题达成一致,进而共同对社会、政权等施加影响。例如,1917年俄国临时政府为何在众多内阁部长反对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战争?而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许多临时政府部长竟都是俄国共济会成员,这两件事情中间究竟有没有联系,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俄国共济会研究还是一种从社会秘密团体,从其会员活动的角度研究俄国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尝试。18世纪后半叶的俄国共济会在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建立出版社,出版书刊、杂志;创办学校,推行教育启蒙;建立救济所,救治无家可归、伤病流离的劳苦大众。19世纪,俄国文学从18世纪的落后状态一跃成为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流派,出现了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Золотой век),产生了众多世界级的文学大家。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也开始形成,涌现出一大批在世界思想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如赫尔岑(А. И. Герцен)、巴枯宁(М. А. Бакунин)等。这一切源于偶然抑或必然?它们与18世纪以俄国共济会员为代表的俄国有识之士推行的启蒙教育有无关系?这显然也是个重要的学术问题。

^① Острецов В. М., *Масонство, культура и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М., 2004, С. 22.

在全球化背景下,俄国共济会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的研究甚至还构成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中国史学者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一个世界性秘密社团,共济会不单是一种流行于欧美各国的政治、社会现象,中国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房建昌先生等学者的研究,武汉、上海和广州等地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有过共济会的活动。欧美一些学者还对中国的共济会组织做过专题研究,如艾伦(Herbert A. Giles)的著作《中国的共济会》(Freemasonry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0)等。共济会是个一脉相传的组织,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和组织原则,因此,俄国共济会研究有助于中国的共济会研究。

第二节 国内外学界有关研究综述

俄国共济会既然是个舶来品,那么它就必定与之最初起源国有着思想和组织的继承关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将共济会(Freemasonry)定义为:“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共济会的传播是由英帝国的向外扩张引起的。共济会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随着教堂建筑行业的不景气,一些投入施工的石匠分会开始接受名誉会员,以便维持他们日益衰落的行会。近代的象征性共济会就是由一些这样的分会演变而来的。共济会常被误认为是基督教组织,带有许多宗教色彩,其纲领强调道德、慈善以及遵守当地法律。会员必须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并坚信灵魂不灭说的成年男子。然而事实上,一些分会歧视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有色人种,因而受到指责。一般说来,在使用拉丁语族语言的各国中,共济会吸引着自由思想家及反对教权的人士,而在操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诸国,会员多是白人新教徒。多数国家的大部分共济会分会将成员划为三个主要等级:学徒(Apprentice)、师兄弟(Fellowcraft)及师傅(Master)。”^①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440页。

共济会进入俄国后,便成为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现象,不仅强烈冲击着俄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和学术现象,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为此,俄罗斯学者(包括俄国学者、苏联学者)^①、欧美学者和中国学者均进行了角度各异、程度不同、观点迭新的研究。

一、俄罗斯学者的相关研究

俄国共济会问题曾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由于其在俄国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加上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它在俄罗斯的复兴,故这一问题近年来得到了俄罗斯学者的密切关注。

俄罗斯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是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的关系,这首先表现在他们的相关研究论著数量方面。

从时间跨度上来说,俄国学者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对俄国共济会有所关注。如 1907 年^②出版的索卡洛夫斯卡娅(Т. Соколовская)的《俄国共济会及其在社会运动史中的意义——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Рус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 XVIII и первая четверть XIX столетия)^③等。

20 世纪 20 年代至 80 年代,由于苏联政府对待秘密团体、宗教组织态度的变化,因此专门的研究成果几无可寻,只是一些论著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共济会问题^④。

20 世纪 80 年代后,俄国共济会问题,尤其是历史上俄国共济会与

^① 中国学术界一般将俄罗斯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时期、十月革命至 1991 年的苏联时期和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时期,本文据此将相对应时期的学者分别称为“俄国学者”、“苏联学者”和“俄罗斯学者”。

^② 本文中 1918 年 2 月 14 日以前涉及俄国历史的所有日期均按俄历。

^③ Соколовская Т., *Рус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 XVIII и первая четверть XIX столетия*, М., 1999, С. 2.

^④ Брачев В. С., *Масоны в России: от Петра I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Глава 1. 代表作有雅科夫列夫(Н. Яковлев)的《1914 年 8 月 1 日》(1 августа 1914)等,在这本书中,作者在使用共济会员涅克拉索夫(Н. В. Некрасов)的供词基础上,对共济会在 1917 年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参见: Яковлев Н., 1 августа 1914, М., 1974.

俄国政治的关系问题重新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目前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查到的 80 年代后出版的与共济会直接相关的研究著作已有一百多部,其中大部分都涉及了俄国共济会与俄国近代政治的关系问题。

涉及 18、19 世纪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关系问题的主要著作有:1997 年再版的佩平(А. Н. Пыпин)院士的《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的俄国共济会》(Масон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XVIII и первая четверть XIX в.)、1999 年出版的韦尔纳茨基(Г. В. Вернадский)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代的俄国共济会》(Рус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Екатерины II) 和 1999 年再版的索科洛夫斯卡娅的《俄国共济会及其在社会运动史中的意义——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等;涉及 20 世纪初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关系的主要著作有:1990 年出版的阿夫列赫(А. Аврех)的《共济会员和革命》(Масоны и революция)、分别于 2000 年和 2006 年出版的布拉切夫(В. С. Брачев)的《20 世纪的俄国共济会》(Рус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 XX века)和《权力下的共济会员们》(Масоны у власти)等。

值得一提的是 2001 年出版的历史学家谢尔科夫(А. И. Серков)的巨著《俄国共济会百科辞典(1731—2000)》(Рус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 1731 — 2000.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在这本长达 1 200 多页的辞典中,作者花费大量心血搜集了 1731 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俄国共济会支部及其成员名单。从这份名单来看,俄国共济会曾吸收了众多政治活动家加入^①。

在俄罗斯(苏联)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关系的论文也很多。从数量上来讲,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涉及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关系的论文有 20 多篇,其中大部分发表在《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卷)》(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8. История)、《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和《苏联历史》(История

^① 从它收录的会员名单来看,十二月党人佩斯捷利、俄国政治家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等都曾加入共济会。参见: Серков А. И., *Рус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 1731 — 2000.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2001, С. 943 — 1222.

CCCP,后更名《祖国历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等权威学术期刊上。从内容上看,涉及 18、19 世纪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关系的论文,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俄国共济会与保罗一世(Павел I)的关系以及俄国共济会与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ы)、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①的关系等方面。这方面的论文有:索罗金(Ю. А. Сорокин)发表于《历史问题》2005 年第 5 期的《保罗一世与“自由石匠”》(Павел I и «Вольные каменщики»)、谢尔科夫 1988 年发表于《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卷)》第 5 期的《俄国共济会史摘录(三种美德共济会支部和十二月党人们)》(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масонства [Ложа Трех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и декабристы])和福米乔夫(С. А. Фомичев)发表于《俄罗斯文学》(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1 年第 1 期的《普希金和共济会员们》(Пушкин и масоны)等。

随着一些与俄国共济会相关的档案的公布,如《苏联历史》在 1989 年第 6 期和 1990 年第 1 期对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收藏的俄国共济会档案资料的披露,使用这些档案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陆续出现在学术期刊上。如安德烈耶夫(Д. А. Андреев)1993 年发表于《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卷)》第 4 期上的《1906—1917 年俄国共济会政治学说的进化》(Эволю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октрины русского масонства 1906 – 1917 гг.)、祖博夫(А. Зубов)2006 年发表于《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第 4 期的《对俄国革命的若干思考》(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причинами революции в России)、罗森塔尔(И. С. Розенталь)发表于《历史问题》2000 年第 2 期的论文《共济会员们与 20 世纪初俄国政治反对派联合的各种尝试》(Масоны и попытки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ппозиции в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等。

以上是俄罗斯(包括俄国和苏联)学术界有关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关系研究的学术史状况,而具体到他们的研究内容,则主要集中在以

^① 将普希金列入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关系的研究范畴主要是考虑到普希金的作品及其思想给 19 世纪初俄国社会、俄国政治思潮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本论文的正文部分做进一步的研究。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评价俄国共济会。十月革命前,沙皇政府对待俄国共济会的态度几经反复：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在位前期对俄国共济会持庇护态度,而后期,由于皇储保罗与俄国共济会产生联系等原因,叶卡捷琳娜二世转而禁止了共济会。保罗一世登基前期采取了与共济会交好的态度,不过,后期也转为禁止。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时期也是如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普通民众由于对俄国共济会认识的缺乏(这一时期俄国共济会的发展仅局限于小范围的贵族群体之中),因此对俄国共济会的评价基本上同官方一致。在学术界,由于这一时期俄国学术发展的不完善,俄国共济会的评价问题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事实上,从1731年到18世纪80年代,共济会是俄国上流社会的一种“时髦”现象,其中蕴涵的是共济会带来的启蒙主义和民主主义因素。从18世纪80年代到1822年俄国共济会被亚历山大一世禁止这一阶段,特别在俄国军队远征巴黎后,俄国共济会已更多地与俄国本土思想结合。1822年,沙皇政府取缔了俄国共济会,但它却没有因此获得消极的意义,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认为俄国共济会代表的是一种进步因素。

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苏联官方和学术界均对共济会持否定态度,认为共济会“通常把道德完善问题和政治上的反动观点联系在一起”^①,“参加共济会的人大半是特权贵族或资产阶级社会上层人物……现代的共济会只分布在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在美国),并且起着为反动派作帮凶的作用”^②。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苏联(俄罗斯)学术界对俄国共济会的认识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认为在俄国,乃至在世界历史上“反动的和进步的社会运动均与共济会保持着联系”^③。

20世纪90年代至今,俄罗斯学术界对俄国共济会的评价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俄国共济会具有反动的性质；另一种观

^①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жегов, М., 1961, С. 332.

^② 符维金斯基等编：《苏联百科辞典》，时代出版社，1958年，第1443页。

^③ 普罗霍罗夫：《苏联百科辞典》，丁祖永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458页。

点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俄国共济会具有进步意义；第三种观点认为俄国共济会充当了一种政治和社会的工具。

目前认为俄国共济会具有反动性质的俄罗斯学者占有一定的比例。如马科戈年科(Г. П. Макогоненко)、普利马科(Е. Г. Плимак)、涅克拉索夫(С. М. Некрасов)等^①。索罗金在谈到这些学者的观点时认为，这些学者“对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行为评价很高，认为在其统治俄国期间对共济会员的镇压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共济会的各种活动也被视作某种邪恶……对他们来说，保罗一世与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相比，不如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同共济会员们保持了紧密的联系”^②。

在俄国，把共济会看做一个反动组织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早在20世纪初，一些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者(Национал-консерватор)开始没有注意到共济会的存在(共济会员们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但很多重要事件，包括1905年革命、国家杜马会议的召开以及当时社会上与此相联系的亲西方自由主义力量的出现，使民族保守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状况并采取措施反对共济会，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共济会密谋(Происки масонов)的言论便出现在当时的保守刊物上。很多学者，如布龙佐夫(А. А. Бронзов)、谢利亚尼诺夫(А. Селянинов)和托尔(С. Д. Толь)等，也都持此观点。他们在引证国外著作(首先是法国历史学家、评论家的著作)时，都一致指出了共济会的反国家、反基督教性质^③。

一些学者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俄国共济会发挥了积极作用。持此观点的俄罗斯学者有：谢尔科夫、卡尔帕乔夫(С. П. Карпачёв)等。他们的观点是“俄国共济会并没有局限于自己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起到的进步作用，它的思想与启蒙哲学以及自由主义思想并无矛盾之

^① 参见：Макогоненко Г. П., *Ноэиков и рус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XVIII века*, М., 1951; Плимак Е. Г., *Масонская реакция против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57, № 2.

^② Сорокин Ю. А., *Павел I и «Вольные каменщик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5, № 11.

^③ 参见：Толь С. Д., *Масонское действ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о заговор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 М., 1914; Бронзов А. 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масонство*, СПб, 1912; Селянинов А., *Тайная сила масонства*, СПб, 1911.

处……很多共济会员都是有名的启蒙思想家”^①。“他们(一些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如佩平等)对俄国共济会员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有所不同,对这些共济会员(首先是诺维科夫[Н. Новиков])的实践活动评价不同,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评价了共济会员们对俄国文化的贡献”^②。

俄罗斯学者的第三种观点是把共济会看做统治阶层内部一些政治社团的工具,而非追求统一全世界目标的独立秘密力量^③。

上述观点在俄罗斯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共济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存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派别,他们分别拥护共和制和君主制,分属于宗教信徒和无神论者,他们中间甚至还有一些冒险家和恶棍^④。

第二,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初的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的关系问题。俄罗斯学者关注的重点有两个:①18世纪后半期俄国共济会与启蒙运动以及共济会员诺维科夫同沙皇政府的关系;②俄国共济会同十二月党人的关系。

俄罗斯学者对18世纪下半期俄国共济会启蒙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诺维科夫共济会小组和施瓦尔茨(И. Г. Шварц)^⑤共济会小组。布

① Михайлова Н. В., *Либер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на рубеже XVIII – XIX веков*, М., 1998, С. 17.

② Сорокин Ю. А., *Павел I и «Вольные каменщик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5, № 11.

③ Брачев В., *Масоны у власти*, М., 2006, С. 45 – 46.

④ Башилов Б.,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масонства*, М.,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3, С. 182.

⑤ 施瓦尔茨(1751—1784)生于特兰西瓦尼亚(Siebenbürgen)。1776年,借助于加加林(И. С. Гагарин)公爵的帮助,他来到俄国。他和加加林公爵的交往是借助共济会实现的,在加加林公爵到西欧进行例行巡游时得知了施瓦尔茨是共济会员后,加加林公爵对他进行了推荐。1776年4月施瓦尔茨来到俄国的莫吉廖夫,在加加林公爵的好友拉赫曼(А. М. Рахман)家中做一名家庭教师,在这里他学会了俄文。不久后,经叶拉金的允许,施瓦尔茨在莫吉廖夫成立了一个共济会“摇篮中的黑尔库力士”(Геркулес в колыбели)(1776—1777)分会。1779年,借助于新的共济会联系,施瓦尔茨移居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很快得到了莫斯科大学德语讲师的席位。作为一个共济会员,施瓦尔茨认为,教育是使人走向“善”的有效手段。“应用科学和教育的手段来发展理性,应当根据基督的理论从小教育人们,因为教育是人在精神发展方面第一重要的事。”参见: *Масоны. История, идеология, тайный культ*, М., 2005, С. 213.

拉切夫教授在《权力下的共济会员们》一书中研究了俄国共济会在18世纪后半期的慈善活动；俄国著名共济会员诺维科夫、施瓦尔茨的出版活动；他们对道德题材的宣传及他们同皇室的关系等。他认为，在18世纪后半期，共济会、道德完善、神秘主义、启蒙主义和慈善活动等，在俄国融为一体。道德完善和神秘主义是共济会员们提高自己，准备把自己磨炼成一块“立方石”（Кубический камень）^①（即有用的石材）的手段，启蒙主义和慈善活动则是共济会员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具体活动。

俄国共济会与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子皇储保罗的关系问题也是俄罗斯学者关注的热点。一些学者根据史料以及保罗周围近臣们的共济会员归属情况，得出结论，认为保罗加入了共济会组织^②。索罗金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虽然保罗同共济会有过比较密切的接触，但由于保罗周围的近臣，包括他的老师等都由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挑选，所以不能夸大俄国共济会对皇储保罗的影响力^③。

俄罗斯学者对19世纪初俄国共济会与俄国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俄国共济会与十二月党人的关系方面。谢尔科夫认为，正是俄国共济会酝酿了十二月党人早期组织的基础，为十二月党人提供了组织经验和人员基础，其早期组织“救国协会”的组织规定更是借鉴了俄国共济会章程的内容。在十二月党人早期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俄国共济会还作为一种合法的组织形式，为其提供了庇护。他认为，如果没有俄国共济会，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十二月党人起义^④。至于后来俄国共济会与十二月党人的分裂，则主要由他们各自发展目标的不一致所致。

第三，俄国共济会在20世纪初俄国政治巨变的情况下发挥了什么作用。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俄国共济会在20世纪初俄国政治巨变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1905年后，随着俄国政治局势的动荡，一些侨居国外且加入了国外共济会组织的俄国政治活动家开始考虑在俄

^① Брачев В., *Масоны у власти*, М., 2006, С. 87.

^② Там же, С. 206.

^③ Сорокин Ю. А., *Павел I и «Вольные каменщик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5, № 11.

^④ Брачев В. С., *Масоны в России: от Петра I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Глава 11, <http://lib.chistopol.ru/>.

国恢复共济会组织,为的是在国家面临重大转折的情况下加入到祖国的解放事业中去^①。

俄国共济会在 20 世纪初俄国政治巨变中的作用首先表现在政党“联合”——联合各个反对派政党这一方面,罗森塔尔就持这样的观点。不过,俄国共济会起到的这种“联合”作用,最初并没有使俄国共济会作为一个组织直接投入到政治运动之中。只是在 1910 年后,俄国共济会才走向政治化并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此时,俄国共济会已明确将国家政治问题列入了自己的议事日程^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多共济会员表现出了高度的护国主义精神,他们参加了前线的战斗并有所伤亡。这种状况在 1915 年后发生了变化,由于俄国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失利,俄国共济会内部的情绪开始激化,一些共济会员认为沙皇政府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他们开始与一些军官联系,密谋推翻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的统治^③。

梅利古诺夫(С. П. Мельгунов)的研究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阐释。他在《在宫廷政变的道路上——1917 年革命前的阴谋》(На путях к дворцовому перевороту [Заговоры перед революцией 1917 г.])一书中提出了 1917 年二月革命前存在共济会密谋的观点。他认为“进步联盟”(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 блок)不是资产阶级阴谋家聚集的中心,当时秘密活动的共济会组织才是这一中心的真实之所在。但是,梅利古诺夫没有直接论述俄国共济会的密谋,而从这一时期俄国共济会员间的秘密联系在这次革命中的作用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④。

阿夫列赫也对二月革命前的俄国共济会与宫廷阴谋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俄国共济会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建立了中央机关和分会,建立了各党之间的联系,为共济会的密谋提供了组织和人员上的条件^⑤。

^① Розенталь И. С., *Масоны и попытки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ппозиции в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0, № 2, С. 52.

^② Там же.

^③ Брачев В., *Масоны у власти*, М., 2006, С. 352–353.

^④ Там же, С. 364–366.

^⑤ Аврех А. Я., *Масоны и революция*, М., 1990, С. 12–133.

关于俄国共济会在二月革命及后来临时政府中的作用,俄罗斯学者也做了有益的研究。依据一些新发现的历史档案(即“俄罗斯人民大东方”[Великий Восток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共济会组织秘书长涅克拉索夫[Н. В. Некрасов]在1920—1930年间所做的笔录),雅科夫列夫(Н. Яковлев)指出,俄国共济会组织当时在国家杜马和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了影子指挥部(Теневой штаб)的作用,事实上成为俄国二月革命的领导中心^①。

布拉切夫在使用一些参与了二月革命及临时政府活动的共济会员们的回忆录的同时,得出结论,俄国共济会在二月革命的胜利完成及后来联合临时政府的组建、克伦斯基对待战争的态度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②。

然而,革命前的共济会密谋及共济会员们参加1917年二月革命的问题在俄罗斯历史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论。争论的中心并非阴谋是否存在,而是进行密谋的是否为共济会组织。雅可夫列夫、别贡(В. Я. Бегун)和普拉托诺夫(О. Платонов)认为正是共济会进行了这样的密谋^③。卡尔帕乔夫和谢尔科夫不太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当时的俄国共济会不是真正的共济会组织,因为它并没有被国外的主流共济会承认^④。谢尔科夫还认为,20世纪初立宪民主党人中的共济会组织属于真正的共济会,只是在1917年前失去了共济会的内涵而成为一个政治组织^⑤。

斯塔尔采夫(В. И. Старцев)的观点较为独特。尽管他不同意共济会密谋的概念,但还是认为共济会员间的联系促进了资产阶级的联合,从而使他们顺利地夺取了政权^⑥。别尔别罗娃(Н. Н. Берберова)认为,在1917年革命前,俄国共济会做了很多事情,为的是让俄国继续参加

^① Брачев В., *Масоны у власти*, М., 2006, С. 43.

^② Там же, С. 323—382.

^③ Там же, С. 44—45.

^④ Там же, С. 44.

^⑤ Серков А. И.,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масонства 1845—1945*, СПб, 1997, С. 109.

^⑥ Старцев В. И., *Рус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масоны в правящей элите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СПб, 1994, С. 18—23.